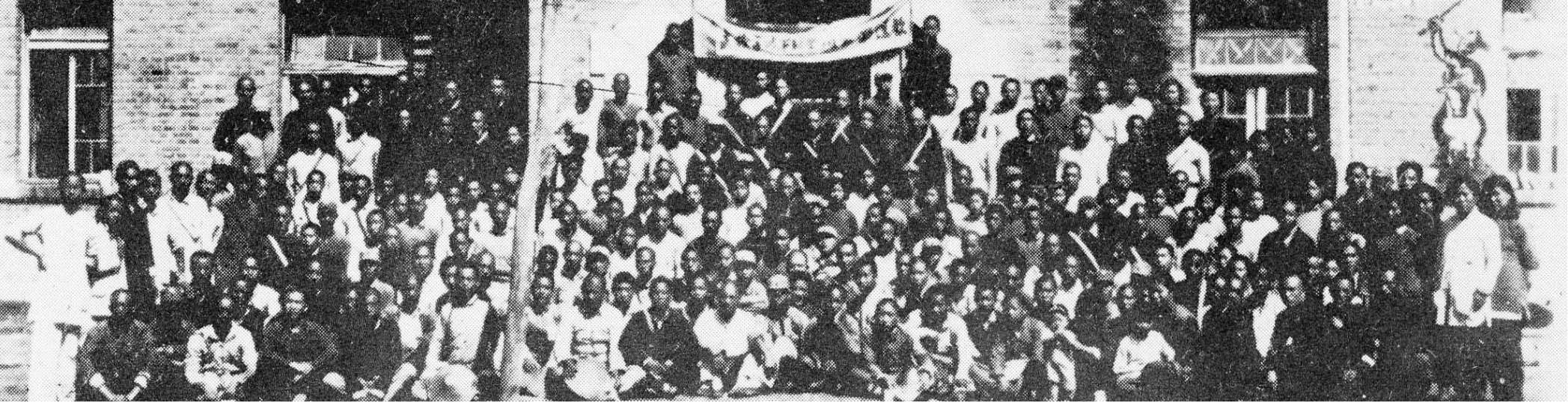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大刀进行曲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

冀鲁边区的“抗大”共办了7期，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。学员在这里转变了世界观，学到了军事战术，成为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——

啊，摇篮！



渤海公校欢送部分学员参加军政学校学习时的合影

□ 本报记者 朱殿封

1938年。7月初的一天清晨，张一然随身带上枪弹，独自从河北省南皮县董村绕路到庆云县，然后转身由东向西走来。

9月中旬，仇鸿翰记哥舅仇鸿印的叮嘱，离开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仇小庄，跨过隔津河向北向南走来。

10月5日，李光远从宁津县起身，一路穿村绕巷由西向东走来。

春节刚过，吕本支带领10名青年，从黄河岸边济阳县启程，经过商河县城由南向北走来。

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同一个地方：乐陵——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。

冀鲁边区办“抗大”

黑云压顶。风丝不透。处暑里“秋老虎”发威，热得夜睡人躺在炕上翻烧饼。

午夜时分，乐陵城里蓦地窜出一彪人马，他们偃旗息鼓，轻装简从，悄无声息地疾步西行。似一阵风吹过，青纱帐发出沙沙声响，夜猫子（猫头鹰）止住叫声，路边野兔仓惶钻进草丛，惊奇地看着这支队伍呼呼走过。

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致残的团政委刘文正清楚地记得：这一天，是1938年8月25日（处暑第二天）。当时他17岁。

这一天，刘文正和百余名八路军战士在永兴支队二营六连周保才（一为周志飞）连长带领下，去执行一项重要的特殊任务：前往鲁西夏津县接应几十名抗日军政学校教官。

两年前，不满15岁的“小小鬼”刘文正在陕西参加了“铁滚”——中国工农红军，当了红二师政委肖华的勤务员。今年8月，肖华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他的家乡冀鲁边区。

抗日战争打响后，冀鲁边区遍地燃起抗日烽火，边区民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纷纷拿起刀枪抗日杀敌。到1938年底，抗日武装发展到1.5万多人，乡村党支部、农救会、青救会、妇救会、儿童团纷纷建立。随之存在的问题凸显出来：部队人员多数由农民、学生、教师组成，间杂三教九流人员，其成分复杂，思想复杂。战士抗战热情高，但不急打仗，不懂战术，干部不懂训练和管理部队，急需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。再就是部队严重缺乏干部，制约了战斗力。因而，在挺进纵队到来之前，第31支队和先期到达冀鲁边区的永兴支队，已着手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、军政训练大队。然而，因缺少教官，影响培训质量。

肖华到达冀鲁边区根据地了解情况后，立即从纵队直属机关和永兴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各部队，同时确定仿效延安“抗大”，在纵队司令部驻地乐陵兴办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，培养军队和地方工作干部。纵队向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求援，派优秀干部来担任教官。师部同意了请求，提出，这些干部身经百战、文武兼备，是革命的宝贵财富，他们前途中要通过敌人封锁区和津浦路，必须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。因此，必须派出部队前往接应。肖华与参谋长邓克明、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等同志反复研究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保才连长。因为肖华的爱人王新兰也在这次调配干部之中，刘文正受命参与了这次行动。

从乐陵前往夏津县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南路经过德平（现为临邑县德平镇）、陵县、恩县（现为平原县恩城镇），一条是西路经过宁津、吴桥、德州（现为德州市德城区）、恩县或武城县。纵队领导分析，南路近，但沿途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薄弱，民众基础差，一连人长途跋涉中一旦遭遇敌人，没有接应，容易闪失。西路较远，但沿途一半路程地带是抗日根据地，相对安全。由此，选择了走西路。

行前，肖华、符竹庭嘱咐周保才：“这次任务特殊，没有告诉沿途地方党政组织和武装，你们单独行动，遇到敌人尽力避开，非打不可不要恋战，绝对保证教官们安全。”周保才立正敬礼：“首长放心，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接近中午时分，周保才率队行进到宁津县西面王圃园村附近，前方传来几声枪响。侦察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：“连长，有敌情！有一股‘小红门’的红枪队在村头路口侦察班接火了。”

当地“小红门”人数众多，组织的红枪会投靠日伪军，如果被他们纠缠住，会很快引来驻扎在宁津县城和津浦路一带的日伪军，那样情况就严重了。红枪会不经打，但是今天打它不是时候。周保才当机立断：“机枪班！”



1938年9月肖华率部抵达乐陵县城，受到当地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

“有！”“你们靠近了红枪会突然开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全体战士随后跟进冲过去！”

“是！”“哒哒哒，哒哒哒”，枪声爆响，突如其来，十数个红枪会员倒下去，其他人随即乱作一团，四处逃避。枪声戛然而止，“哗”地倒过一阵旋风。待惊魂未定的红枪会员回过神来，周保才他们已无影无踪。

越过津浦路，走出二三十里，又遭遇冯二剥皮手下股顽军的阻击。周保才考虑战士们经过半夜半天强行军已经疲惫，甩开敌人绕路而行，对这一带地理情况不熟悉，若敌人尾追堵截，将造成被动。当下上策就是打退敌人，直冲过去。一旦强虏寇边疆，慷慨悲歌奔战场；首战平型关，威名天下扬。游击战，敌后方，铲除伪政权；游击战，敌后方，坚持反扫荡；钢刀插进敌胸膛。巍巍长白山，滔滔鸭绿江，誓复失地逐强梁。争民族独立，求人类解放，这神圣的重大责任，都担在我们双肩。”

随后，冀鲁边区军政训练大队改为抗日军政学校开学了！由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任校长，曾庆红任副校长，朱子伟任教育长，学制由1个月一期改为3个月一期。

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

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类解放，救国的责任，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。同学们，努力学习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，我们的作风；同学们，积极工作，艰苦奋斗，英勇牺牲，我们的传统。像黄河之水，汹涌澎湃，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，向着新社会前进，前进，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！”

嘹亮的《抗日军政大校校歌》从古城乐陵丁字街头东侧中学校园里飘出，飞向广袤的枣乡原野。来自八路军、地方抗日武装、边区党政基层和友军的战士、爱国知识分子、热血青年们，在军校上午学习，早晨、下午军训，晚上上讨论。他们怀揣一个共同的目标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

学习艰苦而快乐。马冲（建国后曾任广西农业厅林业处处长等职）对此记忆犹新：“当时没有自己的政权，军队大部分时间打游击，随处筹粮食菜金，规定指战员与学员同样，每人每日小米一斤，青菜一斤，猪肉五钱，油盐各三钱，每月每人津贴猪肉一斤或黄烟半斤的折价金，每年单衣两套，棉衣一套，每月布鞋一双，毛巾一条，两月一双袜子，一季一把牙刷面粉，棉被一般三年一床，棉被被换季时交公。”

“那时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，课本只有毛泽东同志的《论持久战》是铅印本，也很难得到，其余如游击战术、马国瑞同志的抗日民运原则、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讲话等，则全靠特委机关和部队政治部用土蜡纸油印。刻印的小册子，字小而密，却非常精美清晰，本子小巧易藏。得到一本大家争相传抄，以读为荣，当时求知若渴而得一识一息却不易，所以读后印象很深，讨论也更认真。”

清晨，学员全副武装在枣林里排兵布阵。列队、展开、卧倒、匍匐前进、瞄准、射击、投弹、冲锋、刺杀……“抗战已发生，大炮响连声，前方我弟兄，勇敢杀敌兵，拿一把青龙大刀显威风，活活像关公。天色正黄昏，大炮刚刚停，前方我弟兄，冲杀鬼子兵，看他们一个个脸发青，刀下送了命。男的上前线，妇女随后跟，男的去打仗，妇女看伤兵，你看那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痛杀鬼子兵。男女齐上阵，痛杀鬼子兵，杀声喊连天，打败日本鬼，你看那老头小孩齐欢呼，胜利真光荣！一二三四！（《抗战歌》）”

上午，操场上400多名学员列队席地而坐，鸦雀无声，聆听肖华司令员作《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》报告。肖华讲到关键处挥动着手臂：“同志们，武汉失守后，日寇更向纵深扩展，敌军战线拉得越长，越力也要及，越有利于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。同时也能看到，日寇为了保住占领区，下一步可能要以重兵回师扫荡。目前我们的任务是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坚定必胜信心，打垮日、伪、顽匪的四面围攻，借打胜仗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；大批培养军政干部，提高战斗力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，放手发动民众，依靠民众，逐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，争取最后胜利。”

中午，毒辣的太阳晒爆了大地。一声哨响，学员冲出宿舍奔向操场。教育长朱子伟已经风纪扣紧扣、身板笔直，立正站在烈日下。学员们知道，大雨滂沱、风卷飞雪天气里中午的哨声，多数是朱子伟吹响的。朱子伟高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它前一个名字叫红军，我们是劳苦大众的队伍，目标是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。现在，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的国土，眼看要亡国亡种，你们绝不当亡国奴！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，你们是先鋒队的排头兵。同志们要发扬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、吃草根、不怕苦、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练身骨，练意志，练本领。练兵场上多流汗，到战场上就少流血。”

李光远终生难忘：“为了锻炼学员，一夜行军五十里，次日又夜行军八十里，连续两夜的长途行军，人困马乏，不少人脚上磨起了泡，有些害怕吃苦的人开了小差。副校长曾庆红、教育长朱子伟召开大会讲话，勉励学员坚定信心，克服困难，勇敢前进。同时公布愿意回家者，允许回家。凡回家者，另列出一队，随即离开了队伍。对多数留校的学员，进行了整顿。”

晚上，豆油灯下，学员们分组讨论，交流学习体会。“小鬼子占了大半个中国了，我原先发愁，啥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去呀。听了符（竹庭）校长讲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的三个阶段，我心里算真亮堂了：持久战跟两个人摔跤一样啊，开始咱身子骨弱，撑不过对方。随着不断长劲儿，俩人撂个平手了。接着再再长劲儿，就把对方撂倒了。”

“啥叫游击战？邓（克明）参谋长讲得好啊，游是走，击是打，游而不击是逃跑，击而不游是拼命，这两个办法都不行。‘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’，这16字诀把游击战术说到家了。”

“还有王（国华）主任讲的兵民是胜利之本，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有老百姓支援咱们，瞧着吧，一定能打败小鬼子。”

锣鼓敲，琴弦奏，学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，校园充满了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气氛。文教系主任吕器创作的《难民参军小调》搬上舞台：

左手拿着个瓢哟，怀中婴儿抱，举家逃荒，就把饭来要。

“你家住在哪儿？”

“家住在山东省，乐陵城东，我的庄名叫‘高廷’。”

“老乡，你为什么来要饭？”

“同志们，你问那干甚么？提起这事来很伤心，止不住两眼泪纷纷。”

“去年的夏天，大水波浪翻，满地的庄稼全被大水淹。”

“这水是谁放的呢？”

“问水是谁放，都是那小东洋，鬼子放水淹了地，使得遍地闹灾荒。”

“你们要饭，要到何处算一站呢？你们参加八路军不好么？”



冀鲁边区的战士在表演文艺节目

“同志们的一席话，提醒我梦中人，咱们大家齐去参加八路军。”

“参加八路军，还不快走么？”

“走、走、走，干、干、干，赶走日本鬼，大家得平安。”

文艺骨干燕明（建国后任上海市农委副主任、党组成员等职）后来说：“那时候，学员还直接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。”1938年10月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乐陵，他对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参加抗日活动极为不满，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，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：“你是我的人，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？！”牟宜之坚持立场，跳起来慷慨陈词道：“我牟宜之之长这么大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谁坚持抗日、为民众谋福利，我就听谁指挥，把粮食就送给谁，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！”沈鸿烈恼羞成怒，以升迁为名要强行带走牟宜之。

肖华对此早有预料，提前作了充分安排，组织万人请愿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。燕明、石青等军政学校学员按照司令部和边区特委部署，围住沈鸿烈的轿车，高呼口号：“拥护牟县长主乐！”“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！”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摩擦！”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、老大娘，跪倒在地，面对沈鸿烈兵架起来的机枪毫不畏惧。众怒难犯，沈鸿烈看难以带走牟宜之，只得狠狠地把他推下汽车。学员从中经受了锻炼。

冀鲁边区的“抗大”，是培养军政干部的摇篮。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，前后共办了7期，一期最短的1个月，最长的3个月，最多的一期学员1000多人，共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。这期间，边区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，党员发展到2.5万人。1940年3月，肖华所部八路军主力分8批从冀鲁边区转战鲁西、鲁南地区，从这里带走了近2万名子弟兵。

驰骋疆场杀敌寇

1938年初冬的一天，河北省东光县大队长王哲走出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大门，兴奋地边走边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……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！……脱离了我们的家乡，……流浪！流浪！整日价在关内，流浪！哪年，哪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？……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，才能欢聚一堂？！”

眼下，王哲再唱《松花江上》这首歌，心情已由极度苦闷转为斗志昂扬了。

1937年5月，因叛徒告密，哈尔滨党组织遭受破坏，正在外地“读书”的王哲接到“祖父

病危速归”的电报，躲避叛徒、日伪军追捕，从黑龙江省来到河北省吴桥县焦庄他姐夫家。王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，如同天天生活在黑暗中，他记不清一天里多少次悲愤地哼唱《松花江上》。不久，王哲几经辗转找到了中共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，接上了关系，投入发动民众参加抗日的工作。1938年9月，王哲入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学习。

今天学习结业了，王哲按照组织派遣，到吴桥、德县、德平三边地区发展抗日武装。这年冬天，王哲参与建立了德县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担任大队长。第二年9月，王哲同抗日军政学校学员、德县的武连鹏和德平县的张龙组建了“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二游击大队”，他任指导员。之后，王哲先后任德县和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游击大队长。他率领游击队员在青纱帐里打伏击、交通要道埋地雷、打炮楼、拔据点、炸军火库，出奇制胜，神出鬼没，打得日伪军寝食难安。

日伪军打不垮王哲领导的游击队，便拉拢引诱，给王哲送来伪县长的委任状，被他当场撕得粉碎。敌人又派一名伪军潜入游击队做内线，王哲识破后将计就计。一次，他故意把作战行动方案透露出来，那个伪军准时送出“情报”。第二天夜晚，日军少佐中尾率大队人马前来“清剿”。王哲布下埋伏，敌人刚摸进埋伏圈踏响了地雷，游击队战士们冲向敌人，枪声、喊杀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。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，乱作一团，慌忙逃窜。此战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，缴获敌人枪支500余件，子弹数千发，大获全胜。日伪军对王哲恨之人骨，贴出告示：“有斩八路军王哲头来献者，赏大洋1000块，生俘王哲来献者，赏大洋2000块。”

1943年4月27日，王哲和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率领县委、县政府机关干部和战士80余人，在河北省东光县西大吴村被日本少佐中尾和大汉奸李文成（吴桥、东光等5县“剿共”总司令）的近千名日伪军包围。王哲组织战士奋勇突围，刚刚杀出一条血路，又被冲上来的敌人堵死。敌人饿狼般地扑来，王哲和战士们子弹打光了……终因寡不敌众，李光前、王哲等60多同志壮烈牺牲。王哲英年30岁。

1938年12月，马冲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后，受冀鲁边区特委委派，回到临邑县组建了中共七县（临邑、商河、济阳、齐河、禹城、陵县、平原）工作委员会（简称“七县”工委），他任工委书记。接着，白手起家组建抗日武装。

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”经过周密计划，1939年7月7日清早，由尚贵贵、何凤岐、刘来魁、蔡德礼等人，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向临邑城东门走去。走到城门前，正遇上一个伪军开门上岗，几个人突然冲上前去，捉住伪军，用毛巾堵住嘴，捆绑起来。由蔡德礼看守，尚贵贵同何凤岐持枪飞快闯进伪军宿舍，用枪口对准还在睡觉的伪军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刘来魁等人上前把挂在墙上的枪支摘下来，卸下枪栓捆在一起，命伪军起来穿衣服。就这样，一枪未发，俘获一个班的伪军11人，缴获长枪十支，弹药一宗。

继而，马冲、尚贵贵带人接连消灭了伪军一个班和一个排，他们从开始的十几人很快发展到80多人。7月下旬，打出了“抗日环城大队”大旗。后来，这支近400人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军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。1940年春，在马云齐的带领下，随肖华司令员所率八路军开往鲁西战场，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。

李光远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，一路西行回到宁津县。八年抗战，他大部分时间在这块土地上战斗，真可谓是走刀刀，踩刀尖，步步惊险。回忆这段经历，他感慨不已：“1941年夏天，我被任命为中共宁津县长兼县大队长。宁津是日伪军的治安‘模范县’，驻有日伪军2400多人，敌人在这里实施了所谓‘治安肃正’、‘总力战’、‘保甲制度’等统治手段，对村民实行十户为甲，一村为保的保甲制，甲设甲长，保设保长。村村设情报员，村民都要发良民证，实行连坐法。辅之以‘囚笼政策’，全县821个村庄，设立了122个据点、岗楼；开挖了220多华里深宽都是一丈五尺的洪沟，再用挖出的土在沟边筑成一道高墙；修筑了46条总长475华里的汽车公路。县境内据点林立，洪沟纵横，公路如网，把根据地切成条条块块，使抗日武装主力无法展开，小部队都难以活动，企图把抗日武装扼杀在‘囚笼’中。”

极端残酷吓不倒八路军英雄汉。李光远领导县大队化整为零，分散活动，换下军装，隐蔽行动。

他们在我方掌控的村庄实行“二五减租”、分半减息、雇工增资、合理负担，赢得民众支持。

他们到近敌区村庄贴标语、散传单、演出抗日节目，召集民众开会：“乡亲们，黑暗是暂时的，只要大家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够打败鬼子！”

他们发动民众开展打狗运动，便于抗日武装夜间活动。

他们夜晚带上刀枪和手榴弹，摸到日伪据点、岗楼前喊话：“伪军弟兄们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小鬼子在中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，不要死心塌地给他们卖命！”

他们悄悄走进伪军家里做工作：“告诉你们的亲人不要作恶，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建有红黑点功劳簿，谁作恶就在上面记个黑点，谁帮助八路军就记个红点。”

他们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面前，杀一儆百，震慑敌人。

1944年8月1日，全县军民总动员，一夜即将敌人用一年时间修成的洪沟，多年来建成的公路干线和全部电话线，都进行了大破坏；将伪编乡、保甲制、情报员完全解散取消了，户口册、“良民证”统统收起销毁了，使敌人各个据点、岗楼都陷入了孤立瘫痪状态。到这年初冬，宁津全县只剩下5个据点，日伪的“模范县”彻底垮台了。

……

历经风雨沧桑，不变的是那段历史事实。几十年后，学员辛国治（建国后任南海舰队副政委等职）、王猛（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，国家体委主任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、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）等将军说起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饱含深情：“我们在那里转变了世界观，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，学到了军事战术。这些学员成为冀鲁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中的中坚力量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”

啊，抗日军政学校，冀鲁边区抗日武装的摇篮！